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日】冈千仞 著
张明杰 整理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主 编：张明杰

副主编：王 成 陈 捷



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日】冈千仞 著

张明杰 整理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日)冈千仞著;
张明杰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9.5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ISBN 978-7-101-06684-5

I. 观… II. ①冈…②张… III. 游记-作品集-
日本-近代 IV. I313.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1147 号

书 名 观光纪游 观光续纪 观光游草

著 者 [日]冈千仞

整 理 者 张明杰

丛 书 名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

丛书主编 张明杰

副 主 编 王 成 陈 捷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45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684-5

定 价 28.00 元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总序

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0年,成立不久的明治新政府即派外交代表柳原前光等前来中国,游说清政府与其订约通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翌年,两国代表在天津最终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领馆,准许彼此商民来往贸易等。六年后,以何如璋公使(副使张斯佳、参赞黄遵宪等)为首的第一届驻日使团进驻日本。尽管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与英法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天朝帝国”名誉扫地,但这些以学者、文人为主体的使馆人员,却受到日本朝野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的热诚欢迎。他们经常聚集一堂,把酒论诗,交流思想,切磋文艺,呈现出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迥异的友好气氛。何如璋的出使游历记《使东述略》、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等均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些情况。1879年,以《普法战记》而扬名海内外的报业人士王韬东渡日本,由长崎经神户、大阪、横滨,抵东京,前后游历四个月时间,并将此次东瀛之行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扶桑游记》一书公开出版。王韬此次访日,所到之处受到的欢迎可以说是空前的。日本文士均以能让王韬评诗题签为荣,争相设宴以待,或陪其出游。诚如《扶桑游记》序言中所记“壶觞之会,文字之饮,殆无虚日”,“承诸君子之款待周旋,可谓至矣”。

然而,近代历史的演变,对中国来说异常悲惨。数年后的中法战争,腐败的清政府又让法国打得“落花流水”。再后来,甲午一

战,泱泱天朝大国竟然败于“东夷小国”,这一悲惨的现实不得不让清朝上下为之震惊,使因循守旧的知识阶层猛醒。于是,传统文化上一一直是师长之辈的被日本人尊称为“圣人之国”的国度,一下子把目光转向了这个西化成功的东邻之国,将其看作是学习效仿的对象。清政府基于挽救岌岌可危的自身统治的需要,亦只好推出一些以日本为样板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模仿日本制订新学制,设立新学堂,聘请日本教习,奖励赴日留学考察等项目。甲午战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就派出了 13 人的留日学生,由此揭开了近代中国人赴日留学热潮的序幕。至日俄战争时的 1905 年前后,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高达八千人之多。与此同时,官绅及各地人员到日本游历、考察也蔚然成风,一时间,狭长的岛国日本,尤其是弹丸之地的东京汇集了众多来自中国各地的留学生和游历官绅。其中一些人还写下了考察日记或游历记,如:张謇《东游日记》、缪荃孙《日本考察事务游记》、吴汝纶《东游丛录》、黄庆澄《东游日记》、王之春《谈瀛录》、黄尊三《日本留学日记》、李筱圃《日本纪游》、王景禧《日游笔记》等,为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日记或游记通常被称为“东游日记”,已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竭毕生精力收集这些游记,仅其个人收藏的就多达 227 种,其中晚清的 148 种,民国时期的 79 种。战争期间,为避免民间的贵重文献毁于战火,东京都教育局制订了“战时特别征收图书”制度,实藤将包括这 227 种游记在内的四千余部个人藏书全部贡献了出来。这些“东游日记”如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里。

多年来,我国在“东游日记”的整理出版及研究方面,取得了丰

硕成果,早在八十年代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就收录了《早期日本游记五种》。九十年代以后,又有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本考察记集成》(后来改题为《晚清东游日记汇编》)问世,为推动此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与中国人留下了众多的“东游日记”一样,近代日本人也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游记。目前散见于日本各大图书馆的近代中国游记专著多达数百部,其中以作为国立国会图书馆支部的东洋文库收藏为最,该文库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于1980年编辑出版了《明治以降日本人的中国旅行记解题》,对该文库所收藏的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1926—1989)三个时期(截止至1979年)逾四百种中国游记,作了简要提示或简介。其实正如此书前言所及:“这个数字与明治以来日本出版的全部中国旅行记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由此可以察知,这些游记的数量之多。而且,仅就该文库收藏的游记而言,其中以昭和时期的居多(几乎占整体的三分之二),明治和大正时期即大致相当于晚清民初时期的尚有许多遗漏。这固然由于这一时期距今时间久远,不少游记已很难寻找,一些书甚至已成孤本。而且收藏者又很复杂,除图书馆或特殊文库外,尚有不少是个人或民间团体。因此,全面收集这些游记本身甚为困难。可喜的是,日本游摩尼(ゆまに)书房于1997年出版了由小岛晋治监修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后作为其续篇又相继出版了《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二十卷,收录了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游记65种,其中包括一些世人所不易看到的珍贵资料,大大地方便了读者。但这套四十卷本的中国见闻录集成也只能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游记的精选本。笔者十余年来,一

直致力于日本人所写中国游记的收集和考察,目前我个人收罗或目睹的仅清末民初时期的游记大大小小已不下三百余种,以后将择其精者陆续介绍给广大读者。

前面提到,近代中日两国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始于 1871 年的订约建交。应该指出的是,出于国策的打算,较之中国人,日本人在交流之初就显得异常积极主动。与迟迟至 1877 年末才派使团进驻日本相对照,1872 年初开始,日本即先后开设上海领事馆(首任领事品川忠道)和福州领事馆(领事井田让未赴任),同年 8 月,政府派遣陆军少佐池上四郎等三人前往我国东北侦探考察。早在前一年政府就派福岛九成等九人赴中国留学。1873 年开设香港领事馆,并派遣美代清元中尉等八名陆军留学生赴中国。1874 年 8 月在北京设置公使馆,并开始常驻外交官。同年又开设厦门领事馆。两年后牛庄领事馆和芝罘领事馆也先后开设。同时期,与日本的出兵台湾相呼应,大批军人进入台湾和大陆,从事侦探和调查活动。1875 年 2 月,受政府委托,三菱商会开通横滨至上海间的定期航路,投入“东京丸”等四艘汽船,开始每周一班的航行。同年 8 月,共同运输公司又开通日本—芝罘—天津—牛庄间不定期航线,大大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渡航。

日本政府及其后援组织或企业的这些举措,无疑鼓励和方便了日本人的中国进出。因此,自中日订约建交开始,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组织或个人逐渐增多。这些组织或个人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来观光旅游,有的是来调查侦探,收集情报,有的是来求学或工作,还有的是出于其他目的。其中一些组织或个人把亲身所见所闻或所感所思以日记、游记、笔记、见闻录、报告书、调查书、复命

书、地志、诗文等形式记录了下来,有的已公开刊行,有的尚未正式发表,有的归入秘藏档案。以上这些我们统称之为游记。

当然这些游记中,有的内容比较肤浅,价值不大,有的甚至是作者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偏见和谬误甚多。但其中也有许多颇有价值者。不少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山川景物、风俗民情及物产,而且还记录了作者所拜会的知名人士的逸事,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在撰写游记的组织或机构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在华机构以及日本国内的学校修学旅行团等,其中留下游记最多的当属东亚同文书院。该校每年都组织毕业生分班前往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踏查旅行,其足迹几乎遍及中国的各个省区。作为义务,回来后撰写调查旅行报告书,如《旅行纪念志》(1911)、《孤帆双蹄》(1912)、《乐此行》(1913)、《沐雨栉风》(1914)等,即第8期至11期学生的调查旅行记。东亚同文会于1916年至1920年出版的十八卷本《中国省别全志》,就是根据该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报告汇总编辑而成的。目前国内已出版了几本这方面的译稿和著述。

出自个人之手的游记为数最多。以明治、大正时期为例,这些撰写者从身分来看,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官僚或政治家。如作为驻华使馆外交官的竹添进一郎于1876年5月从北京出发,经河北、河南至陕西,进而翻越秦岭,横断栈道难关进入成都、重庆。后乘舟下长江,过三峡,8月抵上海。其将此次历时百余日的长途跋涉以优雅的汉文写成《栈云峡雨日记》刻印出版。卷首尚有李鸿章、俞樾等名流所作的序。另外较有

代表性的还有：大鸟圭介《长城游记》（1894）、黑田清隆《漫游见闻录》（1888）、村木正宪《清韩纪行》（1900）、米内山庸夫《云南四川踏查记》（1940年版，实为1910年之行）等。

第二、学者及记者、编辑。这类游记较多，如曾历任过《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报社记者或主笔、后任京都大学东洋史学教授的内藤湖南于1899年9至11月游历中国北方及长江流域地区，并与严复、方若、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会面笔谈。事后写下游记《燕山楚水》（1900）。另有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1884），尾崎行雄《游清记》（1884），户水宽人《东亚旅行谈》（1903），德富苏峰《七十八日游记》（1906）、《中国漫游记》（1918），桑原鹭藏《考史游记》（1942年出版，实为1907—1908年之行），竹中清《蒙古横断录》（1909），小林爱雄《中国印象记》（1911），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1918），川田铁弥《中国风韵记》（1912），那波利贞《燕吴载笔》（1925）等。

第三、作家或艺术家。如曾被胡适称为“新派小说家”的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委托，于1921年3月末至7月初，前来中国。从上海登陆后，先后游历苏杭、南京、九江、汉口、长沙等地，然后经洛阳至北京，最后由天津经沈阳、朝鲜归国，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华期间还拜访过章炳麟、郑孝胥、李汉俊、辜鸿铭、胡适等人，并在游记中分别记下了对前四人的访谈录。后结集出版的《中国游记》（1925），即这位年轻作家留下的民国十年时的中国印象记。这类游记还有：鸟谷又藏《中国周游图录》（1914）、夏目漱石《满韩漫游》（1909）、河东碧梧桐《游中国》（1919）、佐藤春夫《南方纪行——厦门采访册》（1922）、木下杢太郎《中国南北记》（1926）等。

第四、教习及留学人员。清末学堂聘请日本教习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史实,教习所留下的中国游记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遗产。如北京东文学社教习高瀨敏德的《北清见闻录》(1904)、先后在陕西宏道高等学堂和湖北武昌陆军小学堂担任过教习的小山田淑助的《征尘录》(1904)、成都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教习中野孤山的《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1913)等。留学人员的游记有从师于俞樾的井上陈政的《西行日记》(1883)、后藤昌盛的《在清国见闻随记》(1884)等。这类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的留学时的身分是学者,则列入第一类型,如桑原鹭藏、宇野哲人等。

第五、军人或所谓大陆浪人。如海军少尉曾根俊虎于1874年为筹备军需物品被派往上海,两年后又派到中国从事谍报等活动,1878年回国后向政府献上《清国近世乱志》和《诸炮台图》。其后又多次潜入中国侦探调查。《清国漫游志》(1874)、《北中国纪行》(1875)等,即其游历之记录。另外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岛弘毅《满洲纪行》(1887)、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1901)、植村雄太郎《满洲旅行日记》(1903)、日野强《伊犁纪行》(1909)、吉田平太郎《蒙古踏破记》(1927年版,实为1919年内蒙古东部及洮南地区的旅行日记)等。

第六、实业家或商人。如:实业家木村条市《北清见闻录》(1902)、古董商中村作次郎《中国漫游谈》(1899)、设立图南商会的阿川太良《中国实见录》(1910)、曾担任过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长的永井久一郎《观光私记》(1910)、在天津经商十余年频繁来往于中日之间的山本唯三郎《中国漫游五十日》(1917)等。

第七、宗教界人士。自古以来,中日宗教界的交流与往来就十

分活跃,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遣唐僧、遣宋僧、遣元僧等为代表的中日佛教之间的友好交往,最能说明古代日本学习中国的这一史实。但到了近代,关系却发生了逆转,出现了日本佛教徒主动打入大陆的所谓“中国开教”。1876年8月,东本愿寺即于上海开设其别院,当时中国人称之为“东洋庙”。其实早在1873年,东本愿寺和尚小栗栖香顶就以调查和布教为目的前往大陆,后以留学身分在北京龙泉寺从本然师学北京话。《北京纪游》和《北京纪事》(1873)即其游学记录。其他较著名的游记还有:河口慧海《西藏旅行记》(1904)、橘瑞超《新疆探险记》(1912)、来马琢道《苏浙见学录》(1913)、大谷光瑞《放浪漫游记》(1916)、青木文教《西藏游记》(1920)等。

第八、儒学者及民间人士。如与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等驻日使馆人员交往甚密的儒者冈千仞,应王韬之邀,于1884年5月至翌年4月前来中国巡游观光。他以上海为据点,先后游历苏州、杭州等地后,又北上天津、北京,最后入广东,经香港回国。其每到一处,必求见当地官绅名流,阔谈时局和救国之策,先后拜访过李鸿章、盛宣怀、俞樾、张裕钊、袁昶、李慈铭、张焕纶等知名人士。其撰写的《观光纪游》(1886)是了解中法战争开战前后时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阶层思想状况的绝好材料。另外,山本梅崖的《燕山楚水纪游》(1899)也是这类游记的代表之作。这里的两部纪游与前面提到的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被称为明治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三部汉文体中国游记。

这些游记本身内容广泛,其社会影响也较复杂,加之作者身分多样,动机不一,因此不应猝然定位,亦难于一概而论。但如果把

它们笼统地分为纯粹以游山玩水为目的的游记和以特殊使命或特定目的而出游的行役记两种性质的话,那么近代日本人留下的中国游记则多属后者。由于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相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正因为这一点,从今天来看,这些游记本身已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而是涉及历史地理学、中外关系史学、经济史学、文化史学等多种领域、多门学科的综合科学,是我们研究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所必不可缺的重要史料。而且,这些游记多配有图画、照片等,非常珍贵。这是同时代中国人写的“东游日记”中所少见的。

我们常说,近代中日关系发生逆转,即古代日本学中国,近代中国学日本。同时也常说,到了近代,尤其是以甲午之战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人由崇敬而变为蔑视。那么,中日关系是如何发生这种逆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由对中国人的敬仰而变为蔑视的?这些游记不失为解读这种演变过程的一方上好材料。因为它们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像短期内一再重版的德富苏峰的《七十八日游记》(1906年11月初版发行后不出两个星期即再版,一年后则发行第三版)、尾崎行雄的《游清记》等不少游记,对当时的日本人,甚至是决策层在对华态度上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另外还有像安东不二雄的《中国漫游实记》(1892)以及极力主张对俄开战的户水宽人的《东亚旅行谈》等,在意识形态领域对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等近代史上的重

大事件也曾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需要 we 认真加以考察和研究的课题。

本丛书主要收录自中日建交的 1871 年至 1920 年前后的游记，但其中也有一部 1862 年“千岁丸”航渡上海时的比较全面的见闻资料。考虑到这是日本开国后第一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土地，并留下的见闻录，故一并收录进来。

在收集和考察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时，笔者一直在思考并痛感到这样一个似乎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对于小到一个人、一个组织，大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认识并明白自己，了解并熟悉对方，同时吸取教训，重视积累，日求进步，是何等重要之事！相信贤明的读者会从这套丛书中得到诸多启发和思考。这也是笔者企划和编选这套丛书的主要动机和目的之一。

张明杰

2006 年 10 月于东京

冈千仞游华及其所作游记

王韬在《扶桑游记》中曾记述：“日国人才，聚于东京，所见多不凡之士，而鹿门尤其佼佼者。”这位东瀛不凡之士中的佼佼者“鹿门”，即本游记的作者冈千仞。他是日本明治时代颇为活跃的汉学家，与黄遵宪等驻日使者交往甚密。1884年6月来华，以上海为据点，历时三百余日，漫游各地，《观光纪游》及其续纪等即此次中国游历之所获。这些文字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社会，尤其是中法战争之际中国官民与知识阶层的思想状况，以及日本学者的中国观等，可谓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一、生平

冈千仞(1833—1914)，生于江户幕府末期，经明治，直至大正三年去世，整个生涯均处于日本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作为生存于其间的儒学者，他的一生也充满了波折。

冈千仞，幼名庆辅或启辅，字天爵，鹿门为其雅号，出生于东北仙台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就读于藩校养贤堂，习四书五经，后游学江户（今东京），改名为修，入幕府直辖的学问所昌平黉，师事安积艮斋等，修经史。昌平黉为当时日本汉学的最高学府，培养了众多知名学者和政治家。鹿门于昌平黉前后长达九年，并曾任书生寮舍长，同窗中有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南摩羽峰、松本奎堂和松林饭山等，其中与尊王攘夷的志士松本和松林二人交往尤契，

后来三人曾于大阪开设私塾“双松冈”(塾名取自三人之姓),培养学子。在幕藩体制行将解体的幕末,日本诸藩及地方势力有拥护幕府的佐幕派和主张尊王攘夷的讨幕派之分,前者以会津藩、仙台藩等为主,后者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代表。鹿门虽身为佐幕派仙台藩的藩士,但却始终倡勤王大义,尤其是在以仙台藩为主的东北诸藩结成“奥羽越列藩同盟”以抗拒王师时,毅然挺身而出加以劝阻和反对,结果被藩主下狱,险些丧命。明治初年,改名为千仞,字振衣。这显然由来于左思“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之诗句。而且他还给收于自己门下的兄长台辅的儿子起名为濯,字万里。

明治维新后,冈千仞曾出任大学教官、文部省职员、修史馆编修等职,但均时间不长,因学校或机关调整而失去职位。1878年初,受聘于东京府书籍馆,翌年担任该馆干事(实际相当于馆长),但一年后因书籍馆归属文部省,他借此机会以眼疾为由辞职,其实作为深层原因与他对藩阀政治不满大有关系。其后他绝念仕途,潜心办塾,授业著述或漫游各地,以一在野文人之身终其一生。他先后于故乡仙台和东京开办过麟经堂、绥猷堂、鹿门书院等私塾,号称弟子三千,片山潜、馆森鸿、吴秀三、小越平陆等即其知名弟子。

冈千仞志向高远,性情豪放,为人耿直,平生尤好论时事。学问以经史为主,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为宗,其文明显优于其诗。对此,黄遵宪在信中有中肯评价:“仆来大国,阅人多矣。然于文最爱吾子……于诗最爱龟谷省轩。虽不敢谓天下公论,然私意如此,不能随他人为转移也。”^①另外冈千仞还对世界舆地、历史颇感兴

^①《黄遵宪致冈千仞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316页。

趣,长于修史编志。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尊攘纪事》、《藏名山房杂著》、《砚癖斋诗钞》、《涉史偶笔》、《仙台史料》、《藏名山房文初集》等,另有《法兰西志》、《美利坚志》、《纳尔逊传》等与人合编或加以润色的译作。据笔者调查,现在仅收藏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征购文库”中的冈千仞著述(含未刊)就多达近五十种,二百九十八册。

二、与清末文人的交往及游华动机

从藩校养贤堂到江户昌平黉,其间冈千仞接受的多是以中国经史为主的汉学教育。他所了解的始终不过是文献上的中国而已,此时他与现实中国尚未发生直接关系或接触。不过,1877年末中国驻日使馆的开设及其后王韬的日本之游,给冈千仞创造了直接与中国文人交往的契机。据《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①等资料可知,冈千仞自中国驻日使馆正式开展工作的1878年初始,即与何如璋(子峨)、张斯佳(鲁生)、黄遵宪(公度)、沈文荧(梅史)等使馆人员有密切交往,常出入使馆或于它处把酒论诗,切磋文艺。后与黎庶昌(莼斋)、杨守敬(惺吾)、姚文栋(子梁)等亦结下了深厚友谊。中国驻日使馆起初在东京芝罘上寺作为临时住处,后移至永田町二丁目。这里离冈千仞位于芝罘下四丁目的私宅不远,这给他与使馆人员的交游带来了“地利”之便。除使馆人员外,他还与王治本(黍园)^②、王仁乾(惕斋)等赴日民间人士以及1879年访日的报业人士王韬也有很深的交情。冈千仞的一首五言

^①实藤惠秀与郑子瑜合编(早稻田大学东京文学研究会出版,1968年)。

^②王治本也曾一度被吸收为使馆实习翻译。

诗如实反映了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

公度与梅史，紫谿亦狂客。

海外得三士，相见莫相逆。^①

当然，冈千仞与其他大多数明治时期的汉学家一样，虽长于汉诗、汉文，但并不通听说，交流完全借助于笔墨。正如冈自身所坦言：“余不解中语，叙寻常寒暄，皆待毛颖子。”^②除笔谈之外，当时他们之间还流行着真正文人式的交往方式，即互赠著述或诗作，并征求对方序跋或评语等。冈千仞的大多著作中均有驻日使馆人员及其他清末文人的序跋、评语及题字。如其《藏名山房文集》，除卷首有署名“岭南黄遵宪”的序文和黎庶昌的题辞之外，各卷文中尚有许多出自黄遵宪与王韬等人之手的评语和圈点。同时，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王韬的《扶桑游记》也分别载有冈千仞的跋文^③。可以说，与使馆人员、尤其是与访日的王韬的交游，成了促使冈千仞赴华游历的主要动机之一。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王韬的访

①冈千仞《藏名山房杂著》所收《鸿雪一斑》卷二。

②冈千仞《观光纪游》之凡例。以下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出自该书。

③关于冈千仞与清末人士之间的交流，除前揭《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外，日本东洋文库尚藏有许多这方面的书柬资料。可参考郑海麟先生整理发表的《王韬、黄遵宪与日本冈鹿门的文字因缘》（《近代中国》第九辑）、《清季名流学士遗墨》（同上，第十一辑）。另有陈捷女士《冈千仞与中国文人的交流——关于〈莲池笔话〉、〈清谿笔话〉等笔谈录》（《日本女子大学纪要人间社会学部》第12号）、易惠莉教授《日本汉学家冈千仞与王韬——兼论1860—1870年代中日知识界的交流》（《近代中国》第十二辑）等佳作。